

习近平“四水四定”重要原则的系统辩证法及其创新意义

李映红,吴超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是新时代水资源管理的必然要求,治水遵循存在与演化、过程与实在的普遍规律,水生态的系统之本性决定了系统观念作为水治理实践的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以系统思维推进水利建设,揭示了治水护水与治国理政的内在关系。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水利思想、中华文明治水用水的生态智慧以及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治水情怀,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定量的、局部的描述来表征水治理的关系结构及其功能耦合,在辩证的时空观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中把握新时代水治理的科学方法论。从“四水四定”的核心内涵以及“城-地-人-产”的耦合协同阐述了系统辩证法在水利发展中的重要性,习近平“四水四定”重要原则中所谋划的“自上而下”的系统规划、“自下而上”的系统实施、“差异协同”系统功能耦合、“纵向贯通”的系统动态调控治水方略,体现了水生态治理过程中的时间调配和空间调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时间统筹和空间布局上系统治理的方法论导向,内含了系统辩证法的整体性、层次性、自组织性、边界性、实践性等特征,形成了新时代治水兴邦的重要战略思想。

关键词:“四水四定”;治水;系统辩证法;实践

“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各地考察调研的关注点,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发力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水资源保护与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论述、作出指示,形成新时代治水兴邦的重要战略思想,并提出城市发展要贯彻“四水四定”原则,即“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1]。2021年,在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方位坚持“四水四定”原则,“走好水安全有效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显改善的集约节约发展之路”^[1]。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亦明

确提出这一原则。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是有不可抗拒的物理极限的”^{[2]54},随着人水冲突日益尖锐,“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3]5}等问题凸显。系统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哲学,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等物质系统为论域,是关于存在与演化、过程与实在的普遍规律的学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水也要统筹自然生态的各要素,不能就水论水。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3]64},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3]72}。

引用本文:李映红,吴超. 习近平“四水四定”重要原则的系统辩证法及其创新意义[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27(4): 20-27.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人文专项)(B220207043)

作者简介:李映红(1975—),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河流伦理研究。E-mail:yingshanhongli@sohu.com

统筹规划“四水四定”,将水资源开发利用限定在水资源承载力范围内,助推城市经济社会、人口规模、土地利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善用系统思维统筹水的全过程治理,分清主次、因果关系”^{[2]54}。他总结了新时期治水之道,形成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系统辩证法形态,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体系。系统论述习近平总书记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的治水理论体系,领悟新时代水生态文明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从而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引下处理好“城-地-人-产”关系,牢固树立国家水安全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有利于明确“水利现代化”与系统化治理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从而更好把握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

一、“四水四定”的理论依据

“水”是自然物质的要素之一,作为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普遍形式,具有不同于其组成要素的特殊本质和运动规律。作为具有使用价值的物,“水”体现了其作为客体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和效用,这也是哲学意义上自然资源的价值。“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4]173}“水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3]64}。在自然系统中,“水”具有自然界的先在性与物质的客观性,作为宇宙机体大系统的单元,处于特定的“自然位置”。“水”及其水生生物群落与非生物环境之间存在信息传递、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具有密切的水力联系。

中华文明传承了以大禹精神为代表的传统治水文化,全民亲水治水理念深入人心。治国必先治水,中国共产党人对治水进行了艰苦的实践探索。水生态系统兼具整体性和层次性,且层次性以整体性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东方社会问题时,强调气候特性、地理条件等与水利的系统关系,分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的整体联系,整个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不仅是运动发展的过程集合体,而且各个领域内部和领域之间存在着“近乎系统的形式”的内在逻辑联系^[5]。从系统辩证法角度看,复杂的水问题往往涉及多个领域(层次)的交互作用。早期人类逐水而居、城市依水而建,自然水体为

人类的都市生活提供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形成了相对和谐的“城-地-人-产”关系。工业革命后,城市成为集中各类生产要素的重要载体,人被视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依附于城市而存在。同时,随着各类水利设施的修建,便捷的交通、丰富的原材料和广阔的市场等因素均超越了水对城市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城、地、人、产”规模影响着流域生态和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布局。

“定”意为“确定”或“决定”,表达一种意向性或是意向的指示性,这种指示性通过“定”来表达事物趋于稳定化的倾向。“四水四定”即“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以水定城”是根据水资源、水环境承载力,合理规划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人口规模、土地利用和产业发展布局;“以水定地”指在干旱内陆区根据水资源情况,严格管制土地利用用途,确保基本农田、建设用地规模与区域水资源刚性约束力相适应;“以水定人”强调人口规模及其城镇化率要与城市水资源最大可利用量相匹配,据此确定城市各阶段人口规模;“以水定产”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良性运转适配水资源承载力,在保障生活、满足生态需求的前提下,综合考量各种因素核定灌溉面积进行水量分配。水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最突出的特点是综合性。水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各层次深度联结,且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城、地、人、产)等相互作用。由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构成的区域水循环系统,通过水系连通参与生物圈的物质循环,保护水资源整体系统是维护河流生命健康的目标法则。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是系统辩证法的核心。系统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由要素和结构耦合所形成的异质共同体,而非各要素间混沌无序的偶然堆积^[6]。物质因普遍联系而构成系统,系统制约下的物质是事物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系统论揭示了自然界物质具有系统性、层次性、自组织性、边界性、实践性等特征。水生态系统具有自稳定、自调节和自组织作用,同时存在系统的随机性和目的性动力机制,以实现结构变换与功能适应性的统一。恩格斯考察各种不同物质运动形式的辩证法时指出,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7]96}“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认识现实的因果关系”^{[7]97}。系统的关键特征在于物质和元素之间存在着“关联”和交互,强调“谋局”先于“谋略”,“略”从“局”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8]20} 习近平“四水四定”重要原则以定量、局部的描述表征水治理的关系结构及其功能耦合,综合考虑水生态、水资源、水环境与各地区动态性的发展战略定位。水生态环境及其治理作为综合性很强的总体规划,绝不能单纯顾及某一方面。因此,不能简单地从治水本身理解水资源保护与发展,而应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看作一个整体,统筹考虑自然资源环境禀赋,推动水生态环境系统保护、综合治理。要用系统思维推进治水,把“定”落实在制度、技术、管理等阈值,以此对“城-地-人-产”进行合理调控。“城-地-人-产”作为生态系统整体的一部分,以一定层次和要素作为中介联结,推动着“水”及其系统诸要素的动态平衡。

基于不同历史时期治水兴水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水利的论述为指导,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水文化精神,传承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治水情怀,其系统辩证法与现代物质系统论紧密相连,将系统看作物质存在的普遍形式,从世界观上把握事物内在的本质规律和相互作用。

二、“四水四定”的系统整体方略

系统辩证法拓展了人们对客观对象本质关系的认识,将视角由物质内部运动引向外部关系世界。物质系统是关系的集合体,治水需要“辩证的综合”,遵循系统科学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9]。围绕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他强调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思路”^{[3]43},认为应“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注

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3]72},遵循自然规律,注重系统修复,否则“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10]174}。系统辩证法理念下,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城-地-人-产”发展与水资源不相匹配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高度关联,各地区需统筹推进,“以水而定、量水而行”,才能有力地推动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作为客观对象,是与外部环境运动轨迹的叠加,系统各要素、各层次与环境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是系统结构维持稳定的重要前提,可通过稳定性机制或自组织实现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要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原则,‘有多少汤泡多少馍’,要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11],习近平总书记从组成、序列、功能等多方面考察水生态,用关联分析替代因果分析,其谋划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差异协同”“纵向贯通”的治水方略充分体现了系统辩证法的界定问题、划定边界、建立连接等基本属性。

第一,“自上而下”的系统规划。一直以来,我国基于治水内生性需求,治水主体虽能因共同利益自愿联合,但共同体内部及相互间的利益冲突,需依靠政府的公共性权威协调,而非社会力量自治。传统上治水依靠官僚组织实施“自上而下”的治理路径,以制度作为基本保障,重点针对大江大河进行“自上而下”的治理。由治水形成的江河湖堰,多层次治水体系的显著特点是局部大于家户,整体大于局部^[1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13]。在共治式水治理中,治水共同体的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如要有效地进行灌溉和防洪,必须有中央机构加以控制^[14]。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保障水资源安全,无论是系统修复生态、扩大生态空间,还是节约用水、治理水污染等,都要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分清政府该干什么,哪些事情可以依靠市场机制。”^{[3]75} 水治理应从根源入手、从水流源头施治,遵循自然客观规律,实现从政府到地方各级的权责分配,从上游整治到下游的统筹推进。例如,实施中的“河长制”明确责任主体,由当地党政负责人担任河长,聚焦责任主

体,避免了跨域水资源协同治理中群龙无首、无法问责的局面,化解了因责任推诿引发的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从水源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3]78}。“河长制”在纵向层面构建的4级至5级河长体系,在横向层面构建的从党委政府到水利、环保、农业等各部门的分工协作体系,将分散的职能聚合为一个综合整体,将碎片化的主体聚合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化解了因目标不一致可能产生的冲突。按照条块结合、分片包干原则,责任被细化分解到每一处污染源、落实到每一个人,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齐抓共管的推进机制,进一步明确权责,形成“自上而下”共同治水的社会共治氛围。水治理各层级之间整体地组织与协调,派生出系统的组织结构和功能行为,系统内部诸要素与外部之间的非线性耦合方式,共同构成水生态系统的特定治理体系。

第二,“自下而上”的系统实施。“禹治水皆自下而上。盖下游宣通,水自顺流而下”^[15]。水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不仅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叠加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水旱灾害频发,自古以来是我国基本水情。”^{[3]4}并强调“碧水保卫战要促进‘人水和谐’。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3]15}。系统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导致“由下而上”的系统叠加,形成多重反馈效应,可能使水生态系统在演化中出现多种偏差。水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社会参与机制的完善,在我国水治理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既有“自上而下”的科学布局,也有“自下而上”的系统实施,“政府主导不是政府包办,要充分利用水权水价水市场优化配置水资源,让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16]“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把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3]79}。治理过程中既有政府引导,也有市场和社会民众作为行动者的互动,而非单向度的规则实施。“自下而上”的治水组织形式、制度架构与运行规则,可形成符合各方利益的制度设计,以政府为主导,建立覆盖流域和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的取水水总量

控制指标体系^[17];实施江河湖库水系连通,“在东部地区,加快骨干工程建设,维系河网水系畅通,率先构建现代化水网体系”^[16],大力实施东北节水增粮、华北节水压采、西北节水增效、南方节水减排等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民众参与治水的理念需要培养,通过“自下而上”的治水实践推进决策实施,完善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设计。当社会力量尚不能有效协同参与时,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进;在民众环保观念增强、水生态意识成熟时,则以“自下而上”为主,最终实现政府与社会力量上下互动、层次有序,实现水生态系统稳定态相联系的叠加和自我调节的良好态势。

第三,“差异协同”的系统功能耦合。“差异协同”指空间上处于不平衡状态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制约和作用。系统各层次之间具有质的差异性,差异协同与自组织说明系统存在着演化的机制与动力,非平衡的“差异协同”是有序之源,表征事物的演化秩序。“水”是动态、生长的生命体,从实践角度理解水的利用可知,流域各地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条件存在差异。由于跨区域、跨业务、跨系统、跨层级互联互通以及流域水生态环境的不平衡,流域水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难以行政区划为单位,依赖传统的中央与地方“条块分割”方式。“要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地上地下、城市乡村”^{[2]56}各子系统的功能耦合,以流域整体为目标,流域管理主体开发利用水资源时充分考虑流域生态整体统筹保护和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水安全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要加强需求管理”^{[2]55};同时,“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推动上中下游地区的互动协作,增强各项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3]114}。因此,应将流域或自然区域视为整体进行多目标规划,聚焦提升水质,坚持上下游、干支流协同治理,明确水生态安全底线,实现对流域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同时,树立“全生命周期”管理意识,进行水生态全周期管理和统筹。跨区域水治理要求各地区、各行为主体站在全局高度,统筹规划落实“四水

四定”,坚持“全国一盘棋,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从中央层面通盘优化资源配置”^{[3]86-87},各地政府注重差异化协同,确保跨区域用水管理和系统优化得到有效回应。

第四,“纵向贯通”的系统动态调控。水资源的流动性、跨域性及其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决定了其治理须由多地域、多部门协作完成。“水已经成为了我国严重短缺的产品,成了制约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重安全问题。”^{[3]6} 横向关联的因素缔结成在整体上使得联系纵深发展,上令下行、上情下达的纵向贯通在某种隶属关系上表现为时间上前后相序,将水治理置于纵向衔接或贯通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在纵向比较中分析、推断,形成整体性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针对各行动主体等多层级需求,从中央到地方贯通省、市、县、乡、村等多级治水体系,使“政府治水”向“全民治水”延伸,水治理的“纵向贯通”和全局性优化充分体现了系统辩证法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18]。方法由问题本身决定,系统辩证法本质是一种方法论,水治理坚持系统观念,正是由全面建设水生态的系统性本质所决定。“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差异协同”“纵向贯通”表述了系统运动、结构、功能等内在联系与演化机制。系统推进“四水四定”并非局限于“城-地-人-产”,而是着眼全流域甚至全国,“有多少汤泡多少馍”^{[4]262},实现“城-地-人-产”的梯度演进,要根据当时当地性,以水而定、量水而行,统筹谋划全流域可持续发展。恩格斯在描绘自然界运动和演化的辩证图景时,强调事物的内在转化是系统的自组织演化机制^[19]。系统辩证法注重全局和局部、过程和阶段、系统和层次之间的关系,寻求系统的最佳合理结构,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四水四定”从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层次、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和作用中,动态把握“水”的整体性与关联性,因而展现出比矛盾辩证法更宽广的思维空间。

三、“四水四定”系统时空的实践本性

习近平“四水四定”重要原则所蕴含的系

统辩证法,贯穿水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水”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它与环境不断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交换,借助外部环境的负熵克服系统内部产生的正熵。系统的内外制约关系决定着水生生态系统的质,赋予其强大的生命力,维系着生态系统整体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客观世界是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序次的系统整体,以水资源为支撑的“城、地、人、产”是流域经济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四水四定”既源于简单中的复杂性,又根植于复杂中的简单性,体现了辩证的时空观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四水四定”系统体系体现了辩证的时空观,是系统辩证法在时空维度上的具体化。第一,蕴含着空间的无尽永在,“自古以来,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3]13}。水作为物质存在,具有“广延”和“持续”属性;同时,治水本身既有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历时性的纵向过程,又有与周围事物的共时性横向联系,处于纵向和横向的交叉关系中。治水要根据水资源禀赋条件,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对水资源进行空间分配。例如,将南方充沛的水资源调拨一部分到北方,以缓解北方的缺水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水资源优化配置抓好,加快全面推进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推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3]62},应走绿色发展产业转型之路,建构城市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互动生产。

第二,“四水四定”深刻阐述了时间的无尽永前。水资源的时间分布极不均衡,呈现夏秋多、冬春少且年际变化大的特点,因此需进行季节调配,截留夏汛之水以备秋冬枯水期使用。水资源循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水定城”的水,广义上不仅指水源,还包括给水、排水等基础设施环节,是自然过程中水资源的时间循环与轮替。习近平总书记强化顶层设计,以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实事求是地考虑以时间过程为变量的规律和内在机制,以及水生态对城市人口规模、产业布局、空间结构的影响,认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

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同时,考察不同物种对水资源的利用在时间上的季相变化,以时间为轴预见未来。明确按照水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内在规律系统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以确保水治理全过程从前期研判、中期实施到后期复盘推演,水资源的时程分布和各个时间节点均能运转高效、系统有序、执行有力。水利可持续发展要求统筹谋划,突出系统思维,既重视水生态系统各个生物单元的空间调控,还要重视系统的时间调配。

“四水四定”系统时空贯穿着人的出场,源于治水的生活实践,对其实践本性的确证指涉了“四水四定”必然是具有发展开放性的制度和理论体系。“四水四定”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既可有重点地单独推进,又需协同推进^[21]。水资源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四水四定”有重点地单独推进,要“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10]419}。城水矛盾突出地区“以水定城”,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如果一个城市过度集中产业、过分拓展功能,人口就会过度集聚,就会占用更多农田和生活用地^{[10]408}。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使城市内部的水系、绿地同城市外围河湖、森林、耕地形成完整的生态网络”^{[10]421}。同时,要“加强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修复,促进生态保护同生产生活相互融合,努力建设环境优美、绿色低碳、宜居宜游的生态城市”^{[3]90};水土矛盾地区要“以水定地”,根据水资源情况对土地利用用途进行严格管制,将水资源作为土地利用规划主要考虑因素,合理规划布局不同行业和城市、农村用地结构和比例;人水矛盾突出地区要“以水定人”“在有限的空间内,建设空间大了,绿色空间就少了,自然系统自我循环和净化能力就会下降,区域生态环境和城市人居环境就会变差”^[22]。通过产业的升级改造等措施来优化布局,控制用水,合理规划人口规模,将城市人口总数控制在城市水资源承载力能容纳的范围之内;区域发展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调整要适应

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水供需矛盾地区要“以水定产”。由要素、连接(关系)、功能(目标)等组成的水生态系统,要素是显性的,关系和目标是决定性的,推进国家水利现代化涉及要素、结构众多,需要搭建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指标体系。水生态是自然链条中的组成部分,其良性循环依赖于各类自然要素的相互依存。因此,治水需要多维度思考,更需要先进的理念和宏大的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8]20}。随着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并显现显著综合效益,黄河“八七”分水方案调整的呼声日益高涨,按照“确有需要”“先节水后调水”原则,调水方案的实施须以“四水四定”方案的编制与实施为前提,同时建立水资源监督管理制度,构建从源头控制到过程监管,并落实考核问责的协调有序体系,推动水生态涵养功能持续向好。新形势下,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自觉的系统辩证法新形态,水利现代化作为其重要内容,需准确把握中国式新内涵,运用辩证思维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水利现代化要将阶段性目标与系统化治理相结合,坚持系统辩证法,强化流域统一规划,明确水资源约束新定位,实现从“以需定供”到“以水定需”的转变,促进“城-地-人-产”的融合共生。习近平“四水四定”重要原则的生成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系和系统的实践性特征,与所处时代条件、历史任务和实践要求紧密相连,蕴含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和求解性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的“水”、治水、水生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作出科学回答,既从系统整体上全面把握依法治水护水,又强调治水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深化了我们党对全面依法治水的认识。

四、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水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具体要求,把“四水四定”作为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红线约束,根据时间、空间、层次、环境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把握水生态治理的特点和规律,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治水思路,把治水兴水纳入民族

发展和国家兴盛的总体战略中。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具有水治理特色的辩证法形态,凸显出辩证法的系统性特征。“四水四定”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流域水资源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的深刻认识,其中蕴含的系统思维与辩证思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要求,也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及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应树立系统整体观念,坚持有序性原则,以“四水四定”为核心,统筹考虑水生态系统的差异性和承载能力,这为我们坚持科学治水、保障国家水安全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四水四定”重要原则的内在旨趣体现了其历史底蕴、理论渊源和价值诉求的系统辩证法智慧,体现了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坚持以习近平“四水四定”重要原则为指引,持续推进新时代水利改革发展,为人水和谐的美丽中国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参考文献:

[1] 王浩,李晓晴. 河湖展新颜 清水润民心[N]. 人民日报,2022-06-09(6).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治水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

[4]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5] 鞠俊俊. 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几个原则[N]. 学习时报,2021-05-10(2).

[6] 范冬萍. 探索复杂性的系统哲学与系统思维[J]. 现代哲学,2020(4):97-102.

[7]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9] 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 立足优势 深化改革 勇于开拓 在建设首善之区上不断取得新成绩[N]. 人民日报,2014-02-27(1).

[10]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1] 张晓松,朱基钗,杜尚泽. 大河奔涌 奏响新时代澎湃乐章[N]. 人民日报,2021-10-24(1).

[12] 徐勇,郝亚光. 中国的社会治水与国家治水[N].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08-13(7).

[13]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9.

[14] 郝亚光. “稻田治理模式”:中国治水体系中的基层水利自治——基于“深度中国调查”的事实总结[J]. 政治学研究,2018(4):48-57.

[15] 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第三十五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7:10626.

[16] 陈雷. 新时期治水兴水的科学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J]. 求是,2014(15):47-49.

[17] 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EB/OL]. (2012-02-16)[2025-07-10]. http://www.gov.cn/jzwgk/2012-02/16/content_2067664.htm.

[18]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56.

[19] 张玉春,刘冠军. 论恩格斯的辩证世界图景[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144-148.

[2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507.

[21] 陈思. 坚决落实“四水四定” 用好管好水资源[N]. 中国水利报,2021-11-18(5).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02.

(责任编辑:余迪)

The Systematic Dialectics and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Defining City, Land,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 by Water” /LI Yinghong, WU Chao (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Abstract: “Determining development by water and acting within water constraint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Water management adheres to the universal laws of existence, evolution, process, and reality. The systemic nature of water ecology dictates the importance of a systems perspective as the foundational philosophy and working method for water management practic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using systems thinking to advance water conservancy development, has revealed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and state governance. Drawing on the water conservancy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water management and us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water management ethos of successiv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PC) leadership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uses quantitative and local descriptions to characterize the relation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coupling of water management, grasping th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for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he organic unity of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space and practicality. The importance of systems dialectics in water conservancy development is explained based on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the “defining city, land,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 by water” and the coupled synergy of “city-land-people-producti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defining city, land,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 by water” include “top-down” system planning, “bottom-up” system implementation, “differential synergy” system functional coupling,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system dyna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These strategies embody the temporal allocation and spatial regu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ecological governance. They are the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n systems governance in terms of “temporal coordination” and “spatial layout”. They embo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ystems dialectics, such as integrity, hierarchy, self-organization, boundary nature, and practicality, forming an important strategic thought for national prosperity through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defining city, land, population and production by water”;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dialectics; practice